

# 音乐 1927年叙事

——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诞生

洛秦



左：部分  
教职员在校  
门口的合影  
右：著名  
音乐教育家、  
作曲家萧友梅  
(1884-1940)

1927年对于音乐而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它几乎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和所有原动力，因为这一年，在上海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即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是由于国立音乐院的诞生，中国音乐迈入了现代性的历程。

然而，国立音乐院为什么成立于1927年？这与创办人萧友梅的另一段经历有关。他于1912年前往德国留学，191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3月搭乘“南京”号轮船，绕道从美国回国。当年9月，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之邀，萧友梅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同时也在其他学校兼职。之后，萧友梅曾先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提交报告，提议成立独立建制的音乐院，并撰写《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将建立音乐院的事业提升到国家与社会的责任、科学与艺术的责任来看待。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1927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下令取消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其他学校的音乐系科。这一时刻，萧友梅理想的“冬眠”被刘哲的无知与蛮横的命令所唤醒。与其说萧友梅是被迫离开北京大学，不如说他是毅然离开了北京。在已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萧友梅作为政府“音乐院筹备员”前往上海，实现了其宏愿——国立音乐院正式建立。

为什么将音乐院建在上海？事实上，萧友梅当时并不十分熟悉上海，正因为留学德国而两度途经。然而，1927年8月前后，即第三次抵达上海后的所见所闻，使得萧友梅确信上海将是建立音乐院的必选之地。他拜访了上海的音乐家，了解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的环境，特别是一场音乐会给予其震撼。他在《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中叙述：

当这个战云弥漫全国，人民感受的痛苦无可告诉的时候，真教人千万想不到在这个孜孜为利、俗气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一种安慰灵魂的圣药与一个极为难得的领略艺术的机会。这不是好看的衣饰，好吃的饭菜，却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厅所主办的

音乐会 (symphony concert)。

事实上，1927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相当丰富和成熟的音乐社会，云集重要的音乐人物，诸如音乐教育家沈心工、曾志志、李叔同、吴梦非、刘质平等，国乐演奏家郑觐文、朱英、卫仲乐等，中国流行音乐鼻祖、作曲家黎锦晖，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谭抒真，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帕器(在其任职的长达23年的“帕器时代”，乐队名声远扬，被誉为“远东第一”)及富华、查哈罗夫、阿甫夏洛穆夫、齐尔品等。仅1927年的数据即可见上海音乐活动繁盛之一斑：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中央戏剧院开音乐会，演出节目包括上海艺术大学的钢琴独奏，民国女子工艺学校的《三蝴蝶》，启贤公学的《明月之夜》等28个节目；大同乐会在市政厅举行“古乐投壶大会”，节目包括《春江花月夜》等三十余个节目；意大利歌剧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托斯卡》《茶花女》《弄臣》《阿依达》《塞尔维亚理发师》《蝴蝶夫人》等9部歌剧；中华歌舞团假中央大会堂及笑舞台举行游艺大会，由黎明晖等三十余人参加演出，表演节目包括《明月之夜》《葡萄仙子》等；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举行歌舞大会，上演节目有《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近十部；中华音乐假中央大会堂举行粤曲大会，有韩江丝竹会、中西音乐会、中华音乐会表演节目。根据现有资料初步统计，仅1921年至1927年，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冬季音乐会”的场次就多达229场。各类音乐会演出，特别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琴行、唱片业、电台广播、音乐出版、舞厅，以及大量营业性音乐学

校，为上海催生了一个几乎与国际同步的音乐商业市场。

上述几个方面已经充分显示了萧友梅选择上海作为创办音乐院所在地的理由。简而言之，上海的音乐社会不仅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而且是亚洲第一，由此也被誉为“东方巴黎”；同时，上海已是中国的重镇，1927年7月被定为“特别市”，是一座国际大都市。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和正视这样一个事实，1927年的上海似乎有一个远离政治的音乐社会，主要存在于租界，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发展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文化空间”。

为实现创办一所具国际水准的音乐院理想，萧友梅不仅选择了上海，更是选择了法租界俄侨居住集中地区的陶尔斐司路作为院址，这是萧友梅深远的考虑。从史料可知，国立音乐院建立之后，萧友梅聘请了很多外国音乐专家前来任教，特别是其中大量俄侨音乐家，诸如查哈罗夫、苏石林、齐尔品都为国立音乐院以及之后的国立音乐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萧友梅没法选择的，甚至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选择的——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十里洋场”的租界，特别是丰富多样的音乐演绎、教育和商业社会，早在1927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国立音乐院建于1927年，那就是中国音乐的“时运”和“宿命”。除了上述的历史语境、音乐社会，最为关键的就是以下的三个人物：蔡元培、刘哲、萧友梅。

萧友梅弃政从教(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音乐教育这一“改良”路径来

救国兴学，所以1920年回国当年就向政府提出建立音乐院的提案，但时机不到、条件不够，不能实现。虽然萧友梅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等同于 Conservatory of Music (音乐院) 的中译名没有被通过(1923年7月，他向北大评议会提出议案，拟将“音乐传习所”改名为“音乐院”)，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音乐传习所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音乐院。所以，在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萧友梅发表了《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向北大提出了三点希望：1) 定名音乐院。2) 增加经费和规模。3) 建立管弦乐队。虽然音乐传习所的情况经努力有所改观，但与日后在上海建立的国立音乐院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创办真正的音乐院始终是萧友梅的愿望。这是其一。

萧友梅在北大本不甚得意，刘哲的一纸命令则成了他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一根导火线。以北洋政府的无知，今天则是刘哲，明天可能是张哲、李哲，说不定也同样会导致音乐传习所的停办。这是其二。

还有其三。如果不是蔡元培当选为大学院院长，萧友梅完全可能漂流各地——天津、广州，不一定是上海，中国音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什么国民政府、蔡元培会请萧友梅来筹办国立音乐院，而不是当时已经开创出一番音乐事业的刘天华、黎锦晖或王光祈等人？显然，萧友梅的身份，即留学归来的作曲家、音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有相似身份的人在当时也并非萧友梅一人。

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的叙事要回到1906年，这一从此影响萧友梅一生的年份。

那年，萧友梅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结识。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28岁的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之后不久，由于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萧友梅离开中国前往德国留学，选择了“弃政从学”的方式。1920年初，萧友梅学成回国……从以上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孙中山、蔡元培及国民政府对萧友梅的信任和重用。萧友梅及其思想、才华和特殊身份——集留日留德的海归爱国理想主义者、才华横溢的音乐教育家、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政府官员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以及孙中山、蔡元培的深厚私人情谊，给予了他实现理想和承担重任的可能。正因此，他才会于11月27日的开学典礼上这么说：

“我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音乐院已经有好几年了，想不到在这种纷乱时局之下竟能开办一个小型的音乐院，这是何等可喜的现象！”

虽说只是穷乡僻壤，举目天下，符合条件的也非俯拾皆是。这其实是历史夹缝中闯出的一群“汪洋大盗”几个世纪以来最后一次地理大发现——他们挑中了世界屋脊脚下的尼泊尔。1972年，正处在叛逆冲刺阶段的多米尼克落脚加德满都，自此着迷了一阵子“东方哲学”，其实就是山洼里的人无奈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而认命服输的借口，却正对了理性主义撞了南墙又被消费主义劫走了神圣的青的胃口。在加德满都一栋土楼改装的旅社，他在香炉和大麻的云山雾罩里，过起了一生最消停的日子。两层土楼里全是他一个范式的青年，伴着蜂群一般嗡嗡的本地侍者，客栈老板却并非土著，娇子们浪归浪，命运的一粒面包屑都不会让土人攥着，早有同胞用一口鸟食买下了楼。

然而新鲜感是人最不忠诚的伙伴。半人半神的生活随着土著学坏变精，就像神龛被撤掉的木椽，失了神光异彩。钱的调教速度是鞭子都赶不上的，直到命运掉转船头。一日，土楼里来了个登山旅行团，攀登爱好者占据了整个旅社的一楼，他在二楼露台上抽烟或读书时，要大白话就可以了，其实这是误解。沪剧唱词要通俗、生活化，也要求生动、有文采，要求还是很高的。要注意对生活语言的提炼，从民间的俗话、俚语以及上海方言中的生动语言汲取营养。

晚年的文牧老师，致力于沪剧史料的研究和沪剧志的编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筹备江、浙、沪滩簧戏研讨与展演活动，担任了《上海滩剧志》的编委，还热情参加《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曲艺志·上海卷》的编纂工作，不辞辛劳搜集资料，执笔撰稿，对沪剧的史料钩沉、史论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我担任《中国曲艺志·上海卷》的编辑部副主任，我们约请文牧老师撰写本滩、锡滩的部分条目，他欣然允诺。他做事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由他撰写的条目有《双买花》《双投河》《灯笼记》《借当局》《游花园》等，他用蝇头小楷写在方格稿纸上，工整齐，且语言精练，非大手笔不办。

上世纪90年代，文牧老师已经患病，但笔耕不辍。有一次他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一些，真希望重返芦苇荡，体验体验生活，写一部《芦荡火种》的续集，以反映阳澄湖地区的新貌。”可惜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要大白话就可以了，其实这是误解。沪剧唱词要通俗、生活化，也要求生动、有文采，要求还是很高的。要注意对生活语言的提炼，从民间的俗话、俚语以及上海方言中的生动语言汲取营养。晚年的文牧老师，致力于沪剧史料的研究和沪剧志的编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筹备江、浙、沪滩簧戏研讨与展演活动，担任了《上海滩剧志》的编委，还热情参加《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曲艺志·上海卷》的编纂工作，不辞辛劳搜集资料，执笔撰稿，对沪剧的史料钩沉、史论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我担任《中国曲艺志·上海卷》的编辑部副主任，我们约请文牧老师撰写本滩、锡滩的部分条目，他欣然允诺。他做事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由他撰写的条目有《双买花》《双投河》《灯笼记》《借当局》《游花园》等，他用蝇头小楷写在方格稿纸上，工整齐，且语言精练，非大手笔不办。

上世纪90年代，文牧老师已经患病，但笔耕不辍。有一次他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一些，真希望重返芦苇荡，体验体验生活，写一部《芦荡火种》的续集，以反映阳澄湖地区的新貌。”可惜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单凭口才，多米尼克不是做电视主持人的绝配人选，他说话没有水龙头滔滔不绝的顺畅，词语从大脑转到舌头上，他可不是个无须动脑的人，相反他需要特别的紧张，才能在艰难的过道里将思想挤压到舌尖，再翻转并不太灵活的舌头把话语送进麦克风。这让他播讲时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窘迫，像在逃避什么压迫，这一丝无奈混同于俊秀男生的腼腆，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木讷和温厚。是这表情为他赢得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她们由于暗暗为他着急，倒生出怜爱之心。影像自有一套对世事的注解，与现实的距离在无数双眼睛的操纵下，可以越走越远。

后来在荧屏上与他照面的人，都很难想象1978年之前的他。那一年之后，在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晶体管屏幕上，他打着领结，带着大波浪的乌亮头发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瘦长平展的脸挂晒了太阳的古铜色，黑眼睛既不大也不凹陷，这倒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欧洲骑士的血脉，那收紧如蓄有细刀削切过的半个亚洲面孔，相比一般人起伏夸张直往外溢的线条，少了些许放肆。而这副容颜背后的他，远没有这般消停。

在这张画面被各种幕前幕后的力量制造出来之前，他还是个浪迹天下的闲人，喇叭裤、花衬衫和蒙头遮脸的长发是他的行头，与后来荧屏上那副发面洁的绅士模样，岔出不知凡几许。这个征战不休的种族在消费社会到来时，凭着男性服饰的花里胡哨，开启了女性化的转变。那时的布尔乔亚子弟，吃穿不愁再搭配点文艺细胞，最时髦的青春消遣就是投身反叛阵列，一场精神解构以宽衣解带为破门钥匙。他这军中贵族子弟，学了几年哲学，既没有经商头脑，又与布尔乔亚的铁杆职业——律师与法官格格不入，更不具行伍从军的身板意气，挤入教书行列亦觉误人子弟，人生目的的羞羞涩涩抱着琵琶不露事，百无聊赖。由此时风送来了无所事事的天赐良机，整个社会正把刚刚到手的热钱有余折换成游山玩水的兴致，大半的青春少年把从命运锦囊里除来的两情逸致扑到旅途和美景之上。

他要走可不是三百公里、几张留影了事，所谓“浪迹”，既非苦志、劳筋骨，亦非改天换地，而是挑个说一不二的地方可着性子浪荡。人啊，不管怎么折腾，逃不开自己的本性，心心念念与自己殖民征服者的父辈反着来，轮到作自己，满世界转角寻觅去找的，还是那份感觉，只不过担当是一根头发丝都嫌重的。那年头，符合这样要求的地方还是一捞一把的，理想的多在热带的岛屿、大山里。气候理应是温暖而阳光充足的，景色必定是未经工业化强暴的，穷要穷到掏出一个子儿就可以当老爷，吃喝住住有一群仆役，靠着货币强势，住个三两年，什么也不干，荷包决不伤筋动骨。

他就沉溺在这难以言表的妩媚里，追随娜塔莉从恒河到湄公河走了一圈。在热带蜻蜓般繁殖的稠密人群里，他第一次依稀看到世上百分之九十九随波逐流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和百分之百将世界纳入自己意愿的人，娜塔莉应该就在这后一群人里。1975年秋冬交割之际，加德满都的无业游民生活在他眼里已然尽失目的，这个与他熟悉的天地反着来的世界，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逃脱的努力一钱不值。他打算把自己这艘沉船拴到娜塔莉温柔臂膀提供的港湾，遂向她求了婚，并决定与她一起打道回府。临行前，她去了一趟泰国，说是十天半月的小任务，让他耐心等待。

他等了一个月，等来了她在曼谷香消玉殒的噩耗。1975年圣诞节前夕她黯然伤返回巴黎。这起将他生命一截两段的大变故，风卷残云将他寻欢撒野的浪荡岁月送到了九霄云外，这人好像是上帝派来押解他回人生既定轨道的。他剪短头发，脱去粗衫，在乔治五世大街道量身定制了埃及长绒棉衬衫和美利奴羊毛套服，打上丝织领带，别上银错金袖扣，在娜塔莉家族的引荐下，走进了这家最大私人电视台。谁都说这是浪子回头，而实际上他是回不去的，任何一场社会梦游，让人逃离开常位置，做着不知在做什么的事，都是有代价的。但他并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更不知道娜塔莉并不是死于曼谷街头，而是越柬边境。这个改变他人生命轨迹的女人，闯入他的生命与走出去一样突兀，并且带走了所有秘密。

1975年秋冬交割之际，加德满都的无业游民生活在他眼里已然尽失目的，这个与他熟悉的天地反着来的世界，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逃脱的努力一钱不值。他打算把自己这艘沉船拴到娜塔莉温柔臂膀提供的港湾，遂向她求了婚，并决定与她一起打道回府。临行前，她去了一趟泰国，说是十天半月的小任务，让他耐心等待。

他等了一个月，等来了她在曼谷香消玉殒的噩耗。1975年圣诞节前夕她黯然伤返回巴黎。这起将他生命一截两段的大变故，风卷残云将他寻欢撒野的浪荡岁月送到了九霄云外，这人好像是上帝派来押解他回人生既定轨道的。他剪短头发，脱去粗衫，在乔治五世大街道量身定制了埃及长绒棉衬衫和美利奴羊毛套服，打上丝织领带，别上银错金袖扣，在娜塔莉家族的引荐下，走进了这家最大私人电视台。谁都说这是浪子回头，而实际上他是回不去的，任何一场社会梦游，让人逃离开常位置，做着不知在做什么的事，都是有代价的。但他并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更不知道娜塔莉并不是死于曼谷街头，而是越柬边境。这个改变他人生命轨迹的女人，闯入他的生命与走出去一样突兀，并且带走了所有秘密。

左岸絮语

## 电视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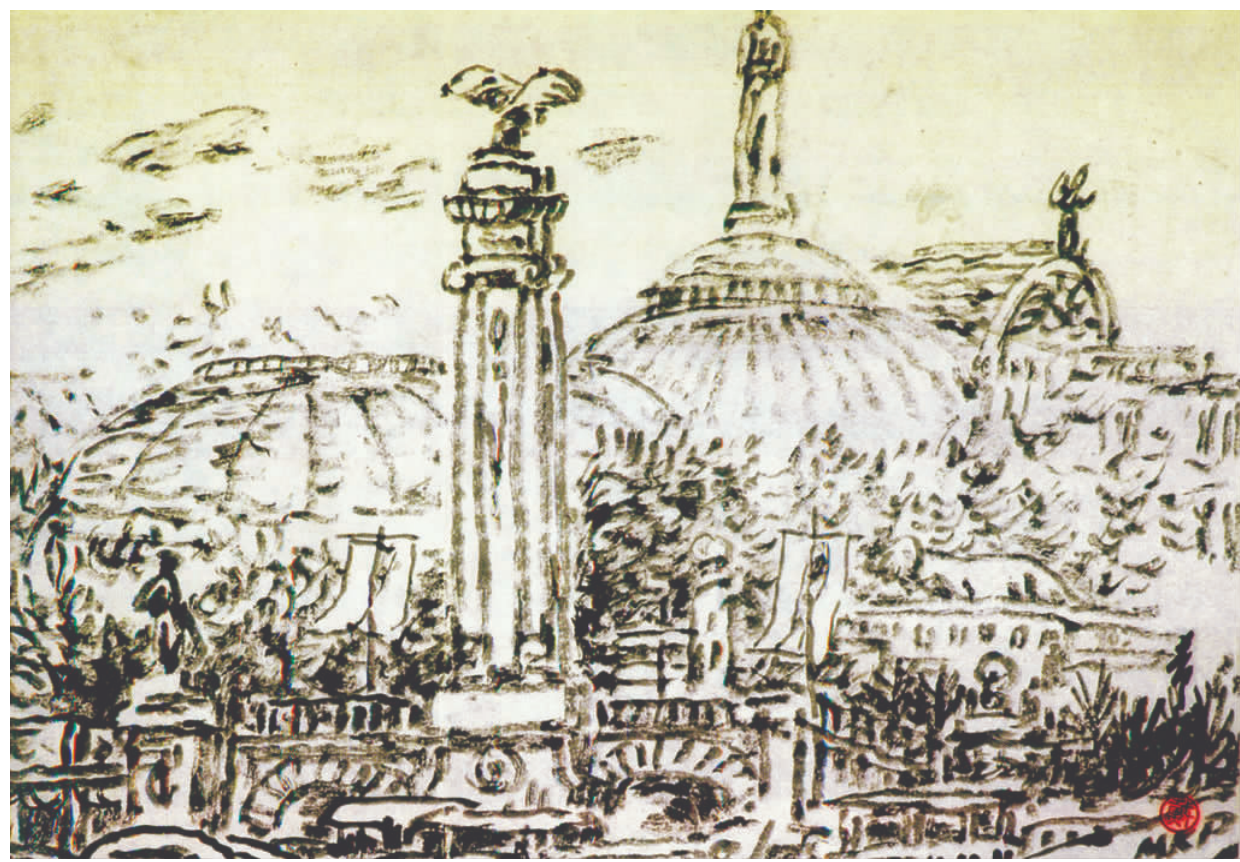
边芹

会看到一个披着浓密卷发的女人婀娜的步伐和让人着迷的脸蛋。他有点惊异究竟是什么迷住了自己，他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近一段时间甚至对异性有些麻木，他由此第一次感觉青春已逝，那家伙走得匆忙，招呼都没打。但一时之下他并没有琢磨透那张晒到象牙色并不太欧化的脸以哪些线条和神情击中了自己。很多年以后，物非人逝，他搬家清理旧照片，在一只已然发黄的信封里，滑落出一张他与她的合影，他们站在一棵大树前，远山有座寺庙，他左臂环着她的肩。已步入晚年的他，时隔那么久，重见永远定格的刹那，才恍悟当年是什么决定了眼睛的选择：她与他的相像！她的脸就是他自己的脸朝完美的方向迈进的那一小步。

为了接近这个叫娜塔莉的姑娘，1974年夏天，他跟着登山者进了大山，十几个白人玩家，前后左右跟着以此为食的土著向导，矮小瘦弱的一大群替代骡马为他们背负登山和露营设备。在海拔五千千米的大本营，他们被恶劣天气困了十多天。两人在这些进退维谷的日子无比接近，好像唯有如此稀薄的空气才能让雌雄二体奔绝他们的肉体只让至真至纯的哲学挤在中间。静谧的黄昏，望着被落霞燃赤的珠峰，他问她那上面究竟有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登山之路到此为止，寻思若为凡人所未见往上爬，颇需魄力，甚至有些无聊的做作。他接着补充了一句，从哲学意义上讲，人只有两种境界：求生和求死。他以为她会跟他描述上面的美景，那是俗人证明自己不俗能得来的最大一笔欠债。不想娜塔莉说你实际已有答案，那是一个最接近死亡的高度，是被推到极限的死亡边缘，所有的苦痛就为了那一瞬间与死亡面对面的寂静和孤独。

弓与弦只在某一点上弹出美妙的音乐，偏离一点点就变成噪音，在他与女人迅速变成噪音的关系中，娜塔莉有如穿透他灵魂的旋律，不偏不倚与他落在弓与弦美妙的这一点——她是他自己心高气远却既无意志也无胆魄抵达的另一头。登山归来，娜塔莉搬进了他的小套间。这女子最让多米尼克爱而不能的是其银行世家的出身与全然缺席的物欲，在学哲学钻生命牛角尖的人眼里，那是一种比登上珠峰与死亡直接对话还要纯粹的状态，丝毫不带这个世界的味道，像是前世修来的，又像是与命运卷裹不下的力量签定了什么契约。那份纯粹让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奉献的魅力，比单纯来自娇柔或性感的美多了几许不易被眼睛识破的妩媚。

他就沉溺在这难以言表的妩媚里，追随娜塔莉从恒河到湄公河走了一圈。在热带蜻蜓般繁殖的稠密人群里，他第一次依稀看到世上百分之九十九随波逐流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和百分之百将世界纳入自己意愿的人，娜塔莉应该就在这后一群人里。



## 笔会

记录

亚历山大大桥

(国画)

戴希斌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最近，上海沪剧团在上海大剧院再度上演著名现代沪剧《芦荡火种》，由优秀青年演员程臻、钱思剑担纲。我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不禁思潮翻滚。剧情把我带回了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我也由此想起了《芦荡火种》剧本的执笔者、剧作家文牧先生。

文牧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62年的冬天。那时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我们几个同学到当时的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文牧先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那天我们去见文牧先生，他瘦瘦的身材，脸色略显黧黑，穿一件藏青的中式棉袄，头上戴一顶绒线帽，说话轻声慢语，一口浓重的上海本地话。

文牧老师做过作曲演员，是在舞台上跌打滚爬历练出来的剧作家。他曾组织班演戏，后来一边演戏，一边跟着学习编排幕表戏。1948年开始在上艺沪剧团兼任编剧，1953正式担任上海人民沪剧团的专职编剧。解放初期，他写作了《好儿女》《罗汉钱》《金黛莱》《鸡毛飞上天》等多部剧作。他执笔的《罗汉钱》还被拍摄成影片，影响遍及全国。

1958年上海人民沪剧团根据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集体改编创作《芦荡火种》，由文牧执笔。他们深入故事发

## 观《芦荡火种》，忆文牧老师

沈鸿鑫

生的江南阳澄湖畔，深入到剧中人物原来的部队，采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文牧又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所执笔的《芦荡火种》，人物形象鲜活，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人栩栩如生。后来又被改编成京剧《沙家浜》，更是风靡全国，阿庆嫂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文牧在沪剧团实习的那段时间，剧团正好带了《芦荡火种》《战士在故乡》等现代戏到农村、部队演出，我也随团前往，所到之处，无不受受到热烈欢迎。

为了让我们熟悉沪剧，当时陈荣兰团长让我们听一批沪剧的老唱片，包括滩簧时期的小戏、开篇等。文牧老师结合这些给我们讲解沪剧的历史，沪剧的

剧目，沪剧的名家。他讲一些剧目往往对它的来龙去脉、主要特色以及有关的趣闻轶事，娓娓道来，听来非常有味。比如说到《小分理》，他说滩簧戏一般比较通俗，但也有文词比较雅驯的，《小分理》就是，其中男女主人公属知识阶层，互称“君家”、“师姐”，曲词亦颇有文采，相传是滩簧才子白秋棠整理的剧本。说到《朱小天》，他说这个曲目写一赌徒押宝，一输着四铤，每押一次增加四倍，从4、16、64、256，层层递进，到十八押，数字为68719476736元，共11位数。演员要一一背出，并一气呵成，难度极高。前辈施兰亭、丁少兰、王筱新、筱文滨均为拿手，丁少兰还创造出“倒轧账”，就是后面由上述巨额数字再层层递减，直到原来的1元。此曲目后成为滩簧中“四铤柱一正梁”之一。

文牧老师还指导我们如何创作剧本。他说搞创作首先要注意生活积累，

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他还强调写戏曲剧本要注意戏曲化，写沪剧剧本要沪剧化。他联系到《罗汉钱》的创作，说原作小说题目叫《登记》，写的是北方的故事，我们把它移到江南来，融入了不少江南的风俗和生活细节，如看灯、调龙灯等。剧本也改成戏曲化的《罗汉钱》，还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沪剧传统表演手法，如“链条箍”“如意头”“撩发势”“拔鞋势”等，加上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沪剧唱腔，这样就打造成了一出原汁原味的沪剧。

和我们讨论剧本的结构和语言问题时，文牧说李笠翁所言“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很有道理，一个剧本主干要鲜明，主要人物、主要情节要突出。情节要新颖，不落俗套。结构要缜密，前有铺垫，后有呼应。文牧老师批评我们写的唱词，要么太深奥，要么太水，淡而无味。他说，有人认为沪剧唱词只